

日用的「戲」譜：《神仙戲術》的形成與 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雙重日常」

葉宇軒*

一、前言

江戶刻本《神仙戲術》，馬場信武(?-1715)編譯，題「陳眉公」著，無界，四周單邊，不分層，小型橫裝，寬12公分，長17公分，13丁(26半葉)，元祿九年(1696)刊行，收錄二十套不同戲法的操作方式，並附加詳細解說。¹

在日本的奇術史研究學界，本書一直以被奉為「日本最古老的魔術教學專書」，受到學者重視，部分學者甚至認為此書乃日本人原創，託名於中國人求售。2015年，²明正德庚午年(1510年)行梓，碧雲散仙編次、題名《新刊足本神仙戲術》的古籍出現於天津的拍賣會場後，此說已不攻自破，但日本學界對於該書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³

本文為東京大學SPRING GX計劃之「自発的融合プロジェクト研究」項目研究成果。筆者首先要感謝該項目共同執行者，宗教學研究室博士候選人伊藤優先生，若非其告知《神仙戲術》的存在，也就不會有本文的誕生，另寫作過程中與小苗會王喬慈、陳柏言、陳湧漢進行過數次深入討論，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之「第十屆中國文化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蒙討論人劉苑如、韓子奇兩位先生及與會先進指教，又獲本刊匿名審查人寶貴的修改意見，經編委會細心修訂，遂得面世。本研究は、JST次世代研究者挑戦の研究プログラムJPMJSP2108の支援を受けたものです。

* 葉宇軒，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博士生

¹ 現為前愛知江南短期大學教授河合勝先生收藏，圖版收錄於河合勝：《日本奇術演目大事典》（東京：東京堂，2021年），頁763-89。

² 藏家本人於2016年1月5日公開購得明本《神仙戲術》的消息，可推測該書最晚當是在2015年重新面世的。

³ 本書後由中國藏家倪冠東（現任江蘇魔術協會副會長）拍下收藏，惜本文未能取得原書圖版，文中提及的內容，皆來自少數公開於網路上的圖像，包含展示影片與數張

〔下轉頁170〕

由於著名日本奇術專家河合勝的介紹，學界通常認為《新刊足本神仙戲術》即《神仙戲術》之底本，⁴但一次機緣巧合下，筆者通覽和刻本圖版，發現其引用之漢文原文的構成形式及筆法特徵，⁵高度接近明代日用類書，通過進一步調查，確認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多次出現題為「神仙戲術」的小目。

在確認題為「神仙戲術」的一系列小型戲法教學條目，是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常客後，接踵而至的問題是，這些趣味性十足卻難見「利生」、「營生」或「自娛」等實用價值的戲法教學，何以為綜合性日用類書所常態性收錄？

這一問題直接涉及「綜合性日用類書」的使用群體與使用情況，換句話說，涉及這類文本在明代後期社會中的定位與機能。如本文第四節所述，學界一般認為此類出版物與庶民——即四民中的「農工商」——關係密切，乃至為其中的識字者直接取用、參考。但透過解明「戲術」門類於綜合性日用類書中建立的過程與意義，本文認為，眾多「日用類書」文獻中其實存在著「雙重日常」：其一是通過文人的中介，以間接的方式參與當時庶民大眾的生活；而另一種日常，實則和當時文人社群的生活樣貌與世界觀／價值觀緊密相接。

以戲術之由來與內涵的深掘為基礎，本文冀能在更大的維度上，重審目前對於綜合性日用類書的既定看法並補充相關討論。

〔上接頁 169〕

照片。見〈《神仙戲術》驚世魔術秘籍沉睡 506 年在中國首次出現！〉，<http://www.52magic.cn/news.asp?id=2762>（發布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讀取日期：2025 年 2 月 12 日）；〈新刊足本神仙戲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k0ixFd-JE>（發布日期：2022 年 2 月 8 日，讀取日期：2025 年 2 月 12 日）；〈首屆「魔術歷史書籍展」在江蘇如東開展〉，<https://www.yangtse.com/content/1680190.html>（發布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讀取日期：2025 年 2 月 12 日）。

⁴ 見河合勝：《日本奇術演目大事典》，頁 763。中國方面，該書藏家倪冠東（魔幻先生）亦稱和刻本《神仙戲術》為正德本之「再版」，見〈《神仙戲術》驚世魔術秘籍沉睡 506 年在中國首次出現！〉。

⁵ 該書內文首列漢文之戲術名稱及解說（含訓點），後附馬場信武自撰和文詳解，詳解中偶爾包含其評論或實作紀錄。

二、神仙留訣在人間：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戲術」

（一）《神仙戲術》與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戲術門」

無論是《神仙戲術》也好，或是下文將述及的「戲術門」也罷，這些「戲術文本」的首要特徵，在於其顯著的教學性質。

就筆法、口吻等書寫風格判斷，可以確信在這些文本背後的，不是享受戲法、驚呼連連的「觀眾」，也不是蒐奇求異、道聽塗說的「紀錄者」。文本中步驟清晰的操作說明，強而有力地昭示著其「教學」的性質。

在明代後期的綜合性日用類書中，這些文本通常被冠以「神仙戲術」的小標題，歸入「戲術」、「玄教」或「風月」等門類，以下列出數部包含此類內容的綜合性日用類書及相關訊息，以概觀其收錄情形：

1. 《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⁶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⁷玄教門(第41卷，共43卷)，前「風月門」、後「法病門」，收戲術41種。
(各書所收戲術節目及順序請見本文附表)
2. 《類聚三台萬用正宗》，⁸萬曆二十七年(1599)，玄教門(第40卷，共43卷)，前「僧道門」、後「法病門」，收戲術63種。⁹
3. 《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¹⁰萬曆二十八年(1600)，¹¹戲術門(第37卷，共39卷)，前「法病門」、後「釋夢門」，收戲術13種。
4. 《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¹²萬曆三十年(1602)，戲術門(第22卷，共25卷)，前「農桑門」、後「課訣門」，收戲術40種。

⁶ 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2004年）。

⁷ 筆者按：書序落款題「萬曆丁酉歲」，其出版當在此年前後。

⁸ 載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⁹ 在眾多日用類書的「玄教門」中，只有《類聚三台萬用正宗》的玄教門收錄了與娛樂、社交無關，而更近於一般道家秘法的咒術，如五鬼搬運、鬼粟隱形、土蛙起霧等。其特殊的分類邏輯與意義，尚待進一步研究。

¹⁰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¹¹ 筆者按：前有萬曆庚子歲(28年，1600)五雲豪士天樂生序，其出版當在此年前後。

¹² 《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書林陳耀吾梓，1602年），現藏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狩野文庫。本書對於探討「神仙戲術」的版本問題意義重大，初稿疏而未引，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5. 《萬用正宗不求人》，¹³萬曆三十五年(1607)，戲術門(第30卷，共35卷)，前「修真門」、後「釋夢瑩宅門」，收戲術12種。
6. 《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¹⁴萬曆三十八年(1610)，仙術門(第35卷，共37卷)，前「法病門」、後「風月門」，收戲術39種。
7. 《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¹⁵萬曆四十年(1612，此為該書第三版)，玄教門(第35卷，共38卷)，前「風月門」、後「卜算門」，收戲術39種。
8. 《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¹⁶萬曆四十二年(1614)，戲術門(第18卷，共34卷)，前「算法門」、後「舞(武)備門」，收戲術33種。
9. 《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¹⁷僅知為萬曆年間出版，風月門(第19卷，共22卷)，前「書畫門」、後「笑談門」，收戲術4種。
10.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¹⁸崇禎元年(1628)，戲術門(附於第23卷「玄教門」之中，共37卷)，前「夢解門」、後「宅經門」，收戲術40種。
11. 《鼎鐫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¹⁹，據冊1之帝王世系可知為崇禎年間刻本，春方戲術門(第28卷，共32卷)，前「笑談酒令門」、後「算法門」，收戲術38種。

根據以上資訊，可得到幾個初步的結論：首先，無論該門類被命名為玄教、戲術、仙術或者風月，大都坐落於整部類書的後半，甚至是最後數卷；所收戲術節目多寡，與卷數總量和出版時間先後沒有顯著關聯。又，儘管不能確定其收錄節目與順序的雷同，是由於其原始資料來源相同(如某版本的《神仙戲術》)，還是

¹³ 載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¹⁴ 同上注。

¹⁵ 同上注。

¹⁶ 同上注。

¹⁷ 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¹⁸ 題陳繼儒編：《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三十七卷(書林懷軒陳恭敬梓行，1628年)，現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放線上閱覽。[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2496037\\$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2496037$1i)(讀取日期：2025年2月11日)。

¹⁹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後出者蹈襲了先行類書，²⁰仍可根據所收戲術節目、順序與內文，將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神仙戲術」文本大抵分為四個系統：

甲：《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鼎鐫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²¹、《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²²

乙：《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萬用正宗不求人》

丙：《類聚三台萬用正宗》

丁：《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

《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因收錄節目過少，難以判別；《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幾同於甲系，雜有丙系的畫虎辟犬及教鵲跳兩套節目。而丁系則較為特別，戲術門下無小題區隔，版式雖為上下雙層，內容卻盡屬他書題為「神仙戲術」者，未收舞醉童法、小兒踏水碗轉法、吞水化骨妙法等。細數其節目，不但和甲、丙各有重疊，又有出於兩系之外者；重疊節目的排序近於丙，但亦有出入。雖不能排除丁系同時擷取甲、丙二系，再另增新節目的可能性，但比起甲、乙、丙三系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收錄數量和排序上，丁系既包含較多獨有節目，排序也別具一格，與其他系統應在相當早的階段便已發生分歧。綜合上述，可知丁系應有著完全不同的文本來源。

上述四系的節目名稱高度重疊，且操作方式與敘述文字雖不盡一致，但基本思路相同，考慮到《新刊足本神仙戲術》的存在，可以推斷這些戲術前綴的小目「神仙戲術」並非類書作者擅自給予的標題，而是一本明代曾經存在，且可能相當知名的文本。²³ 2015年，突然現身於天津舊書拍賣會的《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應是該文本的其中一版。

²⁰ 以類書的性格與明代出版文化而言，後者的可能性較高。

²¹ 此書以「神仙戲術」的標題統攝舞醉童法、小兒踏水碗轉法、吞水化骨妙法及他本「神仙戲術」的內容。

²² 《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雖與其他三書所收節目高度重複，但文字記述卻有明顯出入。

²³ 玉置奈保子對日用類書中法律相關文獻的研究，也指出了明代日用類書的內容經常源於當時通行暢銷的書籍，見玉置奈保子：〈『金科一誠賦』注に見る明代日用類書の構成方法について〉，《和漢語文研究》第12號（2014年），頁143–67。

《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正德庚午年（1510）書林熊氏厚德堂新刊，碧雲散仙編次，上下兩卷，四周雙邊，有界，十行，每行十六字，版心受損嚴重，難辨款式，又長寬資訊不明。部分附半葉插圖（葉數不明）。²⁴書葉受損情況嚴重，以金鑲玉裝修補，據藏家所述，共載有118套節目。²⁵

出版本書的熊氏厚德堂另有《重編傷寒必用運氣全書》（正德八年〔1513〕）、《新刊三車一覽子平淵源注解》（正德十三年〔1518〕）等刊本傳世，《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應為同一時期梓行，可知厚德堂的出版物包含醫書、命書、戲術等無關科舉卻切近文人生活所需的書籍。據《福建刻書考·熊氏刻書》，熊氏乃建陽地區頗知名的刻書家族之一，發跡於熊宗立，²⁶《重編傷寒必用運氣全書》即其所編，前引《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亦為熊氏種德堂繡梓。

正德本《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既名「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此前當存在舊刊本，故該文本的成立時間必早於1510年；而「碧雲散仙」雖身分未明，但可知其人為編者乃至二次編者，匯纂當時散見各書或新興流行的戲法為《神仙戲術》。和刻本《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之底本為元朝泰定己丑（1325）本，其「仙方幻術」一節中，收有「臂上揩符」一項，與《新刊足本神仙戲術》重疊，操作說明的敘述亦大抵相同，兩者無疑存在版本學上的聯繫。

至於江戶刻本《神仙戲術》（及其姊妹篇《續神仙戲術》），因其所收戲術節目與前述諸類書高度重合，²⁷總節目卻遠少於118套，又聲稱原作者為「陳眉公」，其底本推測當為某部託名陳繼儒編輯之綜合性日用類書的戲術門（或玄教門、風月門），但由於戲術節目並不一致（然而，鑒於馬場對文本的強烈介入欲——

²⁴ 以上資訊來自公關於網路之內文照片及影片，詳見注3。

²⁵ 見〈《神仙戲術》驚世魔術秘籍沉睡506年在中國首次出現！〉。

²⁶ 見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然書中指熊宗立堂名為「中和堂」、「種德堂」，據現藏內閣文庫的《重編傷寒必用運氣全書十卷》（二冊，明熊宗立編，明正德八年熊氏厚德堂刊，吉田意庵舊藏）則還有「厚德堂」一號；又《福建古代刻書》指熊氏前期「所刻僅限於醫書……萬曆元年起刊刻了大量的書籍，內容無所不包」，說亦不確：《新刊足本神仙戲術》、命書《新刊三車一覽子平淵源注解》、通書《類編曆法通書大全》皆為萬曆以前所刻。說見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頁285。

²⁷ 據河合勝《日本奇術演目大事典》刊載之圖版，《神仙戲術》及其姊妹篇《續神仙戲術》收錄戲術共40種，多可見於現存日用類書中的「神仙戲術」。

尤見於其隨文評說的文本形式及批判性注解——也不排除他在編譯過程中另外加入了曾聽聞、讀過的戲術），且文字亦有出入，可知馬場信武據以翻譯者，應非前引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之三十七卷本《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亦非尊經閣文庫所藏十六卷本《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²⁸如其對「白雲歸洞」的敘述，即更近《類聚三台萬用正宗》。值得注意的是，《續神仙戲術》收錄了獨見於丁系的火上炙紅字、火上炙黑字、火不燒衣三套節目，則馬場信武譯文的底本，或與《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有著親緣關係。

（二）失之毫釐：「戲術」的性質與實踐脈絡

日本學者通常以「魔術」理解「戲術」，²⁹此說固頗有商榷的餘地，卻也並非不可理喻。的確，就操作方式與效果而言，諸如「白雲歸洞」³⁰、「皓月入亭」³¹、「水中化石」³²等，透過磁力、光線折射、特製藥粉造成炫人耳目的奇特現象，與當代的小型道具魔術似不無相近之處。在探討「戲術（教學）」於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成立與意義之前，必須先明確戲術的性質：究竟何謂戲術？倘若它可以是一門實用性知識，又可能是在何種脈絡之中被實踐？

²⁸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十六卷（書林懷軒陳恭敬梓行，出版年份不明），現藏尊經閣文庫。本書未收戲術相關條目。

²⁹ 如山本慶一：《緒方奇術文庫書目解題——国立劇場演芸資料館所藏》（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2年）；泡坂妻夫：《大江戶奇術考》（東京：平凡社，2001年）；松山光伸：《実証・日本の手品史》（東京：東京堂，2010年）；橫山泰子：〈秘術の公開：江戸時代の手品本に見られるまじないについて〉，《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74集（2012年3月），頁43–55；河合勝：《日本奇術演目大事典》等。

³⁰ 「討葫蘆一個，開孔竅去穢，將磁石一小塊用生漆粘在葫蘆內，取鐵匠家磨刀石槽底下銷囉乾，安在香爐內燒烟，倒將葫蘆向其烟上，烟則如線，盡入葫蘆中去。」（文依《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句讀為筆者所加。）

³¹ 「用圓鏡一面，着在袖內，勿令人見，燈下照之，一輪皎潔在其壁上。」（文依《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句讀為筆者所加。）

³² 「白芨不拘多少為末，溫水調，任意捻成物，放冷水中浸則堅如石。」（文依《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句讀為筆者所加。）

管見所及，在目前的類書研究中，不存在針對戲術的專論，少數涉及的學者，往往將百戲（雜技之流）與戲術並論，且視後者為前者的延伸或變形。³³但是，「神仙戲術」的節目與傳世文獻中可見的數十種百戲名目全無重疊，³⁴暗示了兩者處於不同的實踐脈絡，甚至指涉迥異的社會生活場域。

百戲與戲術的關鍵差異，首在規模與性質的不同。無論是擊鼓、舞獅、說唱、演史，還是舞劍、吞槍、上竿，³⁵無不需要一個範圍明確的特定空間，面對特定或不特定看客展演，營利性質顯著。至於戲術，北大藏《事林廣記》中的「神仙伎術·奇巧伎術」門類下，有詩一首：

點石為金也不難，神仙留訣在人間。
剪成人物能吹火，畫出魚兒也上竿。
白紙自然成黑字，明珠立地走金盤。
韓湘去後知音少，泄破機緘是筆端。³⁶

所謂「戲術」，正是這類行於几案之上的小把戲，而《神仙戲術》就是收錄這些小把戲的文本。

《神仙戲術》所收節目的最大特徵就是所需空間小，不受時地限制。又不同於部分百戲強調驚險刺激，其操作容易，無甚危險性，往往帶有風雅、炫目的特徵，如上述諸日用類書幾乎都有收錄的「白雲歸洞」，即使文字敘述與操作方式存在不同版本，但基本邏輯如出一轍。就筆者所見，「神仙戲術」的常見節目，除飛符法、燈上見蛇影、燈上龍見、辟蚊子法、辟犬法五種確為道法巫術一類，另畫貓辟鼠、畫虎辟犬、辟燕子法可視為傳統厭勝之術的衍生以外，其餘多為

³³ 如作者不明：《中國文明史話》（臺北：木鐸，1983年）；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載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年）。

³⁴ 見《中國文明史話》及《明本大字應用碎金·技藝》（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筆者按：《明本大字應用碎金》為分類聚詞的發蒙讀物，非屬一般日用類書，也因此更能看出時人對於「技藝（百戲雜技）」的核心、基本理解。

³⁵ 以上百戲節目擷取自《明本大字應用碎金·技藝》。

³⁶ 陳元靚編：《事林廣記》（鄭氏積誠堂刊本，元後至元庚辰年），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載《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12。

依靠小型道具操作的戲法，雖須預先準備道具，但所需材料不多、易於取得，更不需要經年累月的反覆練習，道具齊備即可快速上手，與《三才圖會》中的走火、吞劍一類表演，³⁷有著天壤之別。這些門檻極低，本不適合商業演出，加之公開於類書，更已無甚營利空間的戲法，在明代的時空環境中，可能如何被認識與實踐？上述類書的門類安排，提供了有力的線索。

本文掌握的十一部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神仙戲術」多收入戲術門，歸其為玄教門、仙術門者僅四部。無論被命名為戲術門、仙術門或者玄教門，《神仙戲術》在整部類書中的位置，往往與風月門、笑談門、謎令門非常接近，《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甚至直接將其歸入風月門。正如其名，「風月門」記載青樓之事，如基本的青樓消費指南「風月機關」及各式助興春藥、金鎗不倒方，乃至如何撩撥妓女，如何與之進行「風雅的」書信往來、筵席互動等秘訣，是當時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常見門類；笑談門的內容多為真假莫辨的古今笑話、捷對，與謎令門的謎語、酒令一樣，可供讀者在歡宴之際隨時運用或模仿，以活躍氣氛，那麼，「戲術」坐落其間的意義，也就非常明確了：這是在文人雅士觥籌交錯之間，用以助興取樂的小型戲法，《鼎鑄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更是將戲術與春方（即房中術相關）合刻為一卷。

除了《神仙戲術》之外，玄教門／仙術門³⁸／戲術門往往還會收錄「化骨妙法」、「降箕筆法」、「舞醉童法」、「小兒踏水碗轉法」等，與《神仙戲術》的操作原理不同，上述幾項並非戲法，而屬於符法：「化骨妙法」以咒術化去喉中之骨，「降箕筆法」即請神降乩之術。先行研究已指出，宋代以降扶鸞風行，降乩已成為

³⁷ 見王圻纂：《三才圖會一百六卷》（臺北：成文，1970年，據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影印）。

³⁸ 如審查人所言，單看玄教、仙術之名，確容易與道教思想、道法、神仙術做聯想，然而這兩門實際上是高度遊戲性的門類，往往也收入「舞醉童法」、「小兒踏水碗轉法」等內容，和其他類書的戲術門基本一致，僅名稱有別。換句話說，神仙戲術與這些咒法、符法、降乩法之所以同歸玄教／仙術，與其說是以「符咒道法和戲法幻術的相似性／宗教性」為連類關鍵，不如說類同的邏輯在於雙方驚奇、有趣的遊戲性，與實踐場域（飲宴）的一致性——《萬書淵海》的仙術門，即包含「洗滌珠服」、「婦女飾容」兩章，顯與歌妓之流密切相關，可為旁證，前述《積玉全書》更直接將「戲術」與「春方」合刻。

文人聚會的常見活動之一，³⁹至於「舞醉童法」和「小兒踏水碗轉法」，則是以咒術操控童子起舞，以及命小廝立於碗上，以咒術使碗旋轉取樂。

換言之，戲術門預設其讀者為表演者、操作者而不是觀看者。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戲術記載，並非博聞獵奇的、旁觀性的知識，而具有相當的實踐性格，我們也可從中窺見其時飲宴風景之一斑：不只是談風論月，品酒吟詩，更有座中人點燈水面，戲聚蝴蝶。

值得一提的是，據筆者調查所及，在明清小說與文人筆記中，未見文人操作戲術的直接紀錄，但這些空白反倒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訊息，足以讓我們對當時戲術的定位與演出情形，做幾點可信的推測。《金瓶梅詞話》如此描述明代筵席的整套流程：

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捧畢茶，階下動起樂來……獻湯飯，廚役上來割獻花豬……先是教坊間弔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繡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才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侯公吩咐搬演裴晉公還帶記……侯巡撫……酒過數巡，歌唱兩折下來，令左右拏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腳下人等，就穿衣起身。眾官俱送出大門，看著上轎。(第七十六回)⁴⁰

忽聽前廳鼓樂響，荊都監老爹來了。……各分次序坐下。遍里遞上一道茶來……階前動一派笙歌……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須臾上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吊畢，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纔上來……銀箏玉阮放嬌聲，倚翠偎頻笑語。(第七十六回)⁴¹

³⁹ 相關研究成果甚繁，如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第5卷第2期（1994年6月），頁83–115；黃蘊：〈近代中国的扶鸞結社——德教からの考察〉，《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4期（2011年3月），頁41–64；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5期（2017年），頁139–79等。

⁴⁰ 蘭陵笑笑生原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21年），頁2209–10。此處作者讚百戲「齊整」，又將「雜耍百戲院本」並列，則其所謂百戲恐非雜耍，而是體術、舞蹈之類。

⁴¹ 蘭陵笑笑生原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頁2234–35。儘管西門慶出身武官之家（又其發達乃買官而來），其人的文化水平頂多做些酒令、寫點〔下轉頁179〕

以笙歌迎賓入席後，先上諸色料裡，復以樂舞、百戲正式開場，後搬演劇目，戲畢舞罷，或續以小曲。彼時「百戲」似是深受歡迎的宴會節目，在第八十九回中，周守備請藝人搬演雜耍百戲，還特意遣人去永福寺邀春梅同賞。

百戲於小說中頻頻現身，卻缺席於當時的日用類書，和「戲術」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何日用類書中不見百戲的操作方式？本文以為，關鍵在於百戲乃供日用類書的讀者「觀賞」所用，但戲術則為其「實演」所需，日用類書差異的收錄情況，側面暗示了兩者性質的區別與所在脈絡的不同。至於席間娛樂，最常被提及的是「猜枚行令」：

李桂卿不免筭排雁柱，歌按新腔，眾人席上猜枚行令。（第二十回）⁴²

止是吳月娘同眾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第二十一回）⁴³

儘管在筆者掌握的資料中，未見以戲術助興的紀錄，但可以推知的是，戲術不同於觀戲、聽曲等「專人、專場、專項」且定著化的宴會節目，也不屬於猜枚、雙陸、酒令等多人參與的、社交性濃厚的互動遊戲，如同戲術在日用類書中呈現的形象：短小簡易，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它更可能被穿插於觥籌交錯之間，偶然地、個人地演出。這多少解釋了有關記敘的闕如：這些信手拈來的小把戲太過瑣碎，有曲藝、歌舞等專業、盛大演出的珠玉在前，戲術很難成為描寫宴會時的書寫對象，而作為小說的一部分，通常情況下，分量輕巧的戲術不足以發揮推進情節的動能，也不如盛大豪奢的歌舞、菜品，能立體、迅速地建構宴會酒席的印象。

有關戲術之使用情形，儘管尚欠直接的紀錄，然而本文認為，若發源於秦漢的雜耍百戲，是面對特定（宮廷、富戶）或不特定（市井）人群進行的營利表演，戲術則在中世以來泛文人階層至關重要的社交生活中，負擔著重要的職能。自從「日用類書」的命名被廣為接受以後，已有許多學者談到其中部分內容「不切

〔上接頁178〕

打油詩，且《金瓶梅》中的多為筵席家宴，但西門慶的交往對象不乏科舉出身者，又《金瓶梅》乃出於文人之手，其中對社交生活的描寫，理應借鑑了不少自身的生活經驗，對於明清宴會的再現，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⁴² 蘭陵笑笑生原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頁488。

⁴³ 同上注，頁522。

日用」或「無益營生」的問題，有人從階層區隔的角度，指出「書畫門」的知識屬於不同文化空間的流行話題，也有人嘗試從晚明知識史與政治的變動切入，對「諸夷門」的意義做概括性的解釋，⁴⁴相關討論整體越趨抽象。但在「戲術門」的例子中，可以發現如今看來實用價值不明的記載，曾呼應了部分人群日常生活中確切的實作需要，如此看來，重審「綜合性日用類書」之形成過程，並在此基礎上重新錨定其文本性質與機能的工作，仍有其必要。

三、泄破機緘是筆端：「戲術門」的形成

如果同意綜合性日用類書「戲術門」的內容，實際上是明代文人宴席娛樂文化的一部分，就會面臨另一個問題：為何其中的「神仙戲術」會包含洗衣、辟獸等性質迥異的內容？

前節所引各類書之「神仙戲術」的內容高度定型化，只有節目多寡的差別，而其中如「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蟻法、辟蚊蟲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等條，都與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等的性質頗有差距，命名方式、書寫風格亦殊不相類。對此，如吳蕙芳、王正華等學者提出「明代特殊論」加以解釋，亦即認為明人根據某種異於當代的特殊邏輯，將這些生活小智慧一併視為戲術。⁴⁵事實上，由於這種前現代特殊論非常便利，不只是戲術門，在學者論及諸夷門時，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⁴⁶但許暉林則指出「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實證地理知識與《山海經》中非人類的異族交錯混雜的情況，並非晚明日用類書所特有，而是承襲自元末明初的旅行誌。」⁴⁷換言之，要回應前述的晚明特殊論，必須透過書籍史的考索，勾勒文本成形的過程。

⁴⁴ 參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期（2003年9月），頁1-85；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69-92。

⁴⁵ 吳蕙芳指出「當時民間所稱之戲術，還包括一些今日廣為人知，但當時卻少有人了解之日常生活中除污去垢、防蟲避獸的方法。」見其《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336-37。

⁴⁶ 王正華即以晚明社會的好奇風尚與晚明對「知識」的不同態度，來解釋諸夷門的存在原因與混亂破碎的纂輯方式。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6。

⁴⁷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頁8。

(一) 框架的確立：《事林廣記》的編成與誤植

回到類書之「書抄」、「分門纂輯」的基本性質，類書一般不會任意增添所收文本的內容，多是根據不同的需要進行刪減、合併，換言之，可以假定類書小目「神仙戲術」中「戲術與洗衣、辟獸法相雜」的文本型態理應前有所承，被整套照搬入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之中。

現存文獻也可以證明這個假說。戲術與「生活小妙方」性質的條目，並不是在成為綜合性日用類書之一「門」後才被混同的，根據網路上公開的部分目錄，可知正德本《新刊足本神仙戲術》已收入治牙疼、除衣虱、呂仙人固精法等，並與戲術節目相雜。前文已然提及，《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是元明以來累積的戲術彙編（且是重編），那麼，它將上述內容並稱為戲術的體例又從何而來？

回過頭自「生活小妙方」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它們是否一直以來都跟戲術同屬一類？答案是否定的。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1568)⁴⁸、《多能鄙事》(1563)⁴⁹、《便民圖纂》(1593)⁵⁰這三部年代較早的綜合性日用類書，皆未著錄戲術相關內容，卻多收有洗潔、辟蚊蠅的條目，《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將清洗各色衣物的知識歸入「洗鍊」，將清潔珍珠、赤色珠、象牙等物的知識歸入「閨閣事宜」，也載錄了一些辟蟲去虱的藥方（值得注意的是，其「燈火備用·風前燭」一條，雖名稱與做法與不同，但其達成的效果，可說就是《神仙戲術》中的「吹燈不滅」）；《多能鄙事》則收錄大量有關清潔的條目，包含象牙、珍珠等，以及各種染衣之法，其中可見後世被歸入戲術者；《便民圖纂》的「製造類」收入洗衣、洗象牙、珠翠、燈火、辟蚊蟲等知識。如果元、明人，至少明代前期部分類書的編纂者，並未將洗衣、辟蚊蟲等知識和戲術綁定，它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⁴⁸ 有元代殘本，現存明慶隆二年(1568)刻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李仁淵針對《居家必用》等「家庭百科」在元代之出現，並於明代成為家庭百科之經典的過程和意義進行了深入梳理，文中同時指出，雖日用類書往往被視為晚明商業出版文化的一部分，但許多現象實際上已可見於元代。說見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卷第3期(2021年9月)，頁509–60。

⁴⁹ 初版於明初刊行，現存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刻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⁵⁰ 成書於弘治年間，現存萬曆年間刊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

前節曾引用北大本《事林廣記》附於「神仙伎術·奇巧伎術」下的詩作（「點石為金也不難……」），但本詩被繫於此處其實是頗成問題的：該本「神仙伎術·奇巧伎術」所收錄的內容淨是冶金、造珠、洗滌、清潔諸法，亦即部分類書中的「製造」、「洗鍊」之類，與上引詩作的內容全不匹配。

現存流傳較廣的《事林廣記》有四個版本，一是元祿十二年（1325）和刻本《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以元泰定己丑年（1325）本為底本；二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元至順年間椿莊書院刊本；三是內閣文庫藏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四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後至元庚辰年（1340）鄭氏積誠堂刊本。其中，僅北大本有「神仙伎術」一門，但正如前述，其內文與門類名稱皆和題詩不切，反而和刻本癸集卷十二有「仙方幻術（內文標題與目錄相異，為『神仙幻術』）」一門，包含「造指南魚、造指南龜、喚狗子走、臂上指符、水上點燈、火上炙字、玉女傳書、水草吹火、葫蘆相打、葫蘆出水、葫蘆請藥、葫蘆自走、擔水不起、手帕盛酒、水面浮畫」，完全符合後世所謂戲術的特性，且同卷門類尚有「玳筵行樂」、「綺席豪奢」，前卷（卷十一）為「花菓品題」，後卷（卷十三）為「詼諧文話」、「花判公案」、「嘲戲綺語」、「摘奇故事」，此分類邏輯正與前述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相當，將林林總總有關飲宴的知識匯聚一處，以便運用。

至於北大本《事林廣記》，應是誤以「珍奇製作門」為「仙方幻術」，導致內容與標題不符：和刻本置「珍奇製作門」於癸集卷九，其內容與北大本「仙方幻術」幾乎一致。另外，北大本「神仙伎術」之題詩的出處亦待考證：比對和刻本之「仙方幻術」，僅第三聯出句「白紙自然成黑字」，與和刻本所收「火上炙字」節目相類，其餘所謂「剪紙吹火」、「畫魚上竿」、「金盤走珠」皆未知何指，可知此詩或非出自陳元靚當時，其描寫對象與收錄原因，也有待進一步確認（就文字敘述的效果上而言，「剪紙吹火」或為《神仙戲術》中「鬼吹火／鬼吹燈」的另一版本，而「盆中走魚」若做法稍事變更，似乎也可達成「金盤走珠」的效果），但通過此詩，可知元明之際除了和刻本收錄的節目以外，尚有其他許多戲術存在，且很可能也是於歡宴之際助興所用。

與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援引現成的《神仙戲術》不同，《事林廣記》延續中古類書書鈔、書摘的性質，和玳筵行樂、綺席豪奢、花菓品題、詼諧文話相同，「仙方幻術／神仙幻術」並非書名，而是類書纂者自立的門類小標，諸戲術之間連結薄弱，正德本《新刊足本神仙戲術》的存在，暗示了類書編纂史上一個

可能的轉折：《事林廣記》等類書的門類，被單獨抽出、補充為《新刊足本神仙戲術》等專書銷售（其書名當是受到《事林廣記》的影響），到了明代後期，又再次被刪減、摘錄進綜合性日用類書中（這一時期，市場上可能是專書與類書併存）。過去研究者往往強調明代日用類書在形式、編目與內容上對前代類書（如《事林廣記》）的承繼，但考量上述可能性，則在前代類書與晚明綜合性日用類書之間，或許還存在著許多書籍史上的曲折。

以類書的基本纂輯方法：「抽取→彙編→重組」為線索，可以肯定清潔、辟獸、辟蚊蠅等條目，最初與戲術是斷然區隔的，稱清潔、造物等知識為戲術，乃編者誤將「珍奇製作門」與「神仙伎術」相混的結果，而非元、明時人共通認識的反映；而後出類書（如《便民圖纂》）的「製造類」，相較宋元類書，又新增了驅蟲藥劑的配製。在前述兩個因素的影響下，專書《神仙戲術》的編者，於是將戲術、洗滌、製造等內容一併蒐羅收錄，而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以之為底本，精選為類書小目「神仙戲術」，才形成了如今所見的、混雜的戲術框架。

從書籍出版的實作面而言，即便後來的編者意識到如此分類不妥，綜觀現存綜合性日用類書的構成，也確實很難為洗衣清潔、辟蟲蠅猛獸等條目找到合適的門類安放。洗衣清潔或還能歸入「風月門」或「閨閣門」（多數類書也確實是這麼做），後者卻無門可歸，但在「分類成書」的大前提下，知識之為知識，必須要成類的，當部分知識的篇幅不足以自成一門，又沒有完全切合的門類可以安置時，可想像纂者以「奇效巧技」、「鮮為人知」為連類邏輯，保持這些內容與戲術相雜之現況的不得不然。這類「湊合」情形，在綜合性日用類書編纂上尚有旁證：在多數綜合性日用類書中與《神仙戲術》同屬一門的「吞水化骨法」及「小兒踏水碗轉法」，實際上屬於符法咒術，與《神仙戲術》殊不相類，但《類聚三台萬用正宗》、《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卻將之併入「神仙戲術」中，恐即因兩者內容單薄，相較同一門的《神仙戲術》未足以自成一格之故。《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亦將「婦女飾容」以「新增附此」的形式，歸入仙術門之中。並且，一旦這樣的做法被廣為採用，作為商品及工具書，為確保查找使用的便利性（攸關其市場競爭力，好比手機充電線跨品牌的標準化），新出類書對既有門類名目與分類邏輯的調整空間非常有限，幾乎只能決定內文份量的增減，因此，戲術所在門類的名稱雖不固定，但各書大抵斟酌於玄教與戲術之間，少見異例。其形制、內容與分類於是慣例相承，不斷延續。

(二) 格物、役物、戲物：既存文本的「戲術化」

若明代日用類書中的戲術條目，上承《事林廣記》所確立知識架構，那麼《事林廣記》的諸般「仙方幻術」又是從何而來？存在更早的「戲術教學總匯」文獻嗎？這類文本的出現，究竟可以上溯到何時？

本文認為，宋元之間就算不是「仙方幻術」一類文本的初始，也是最為關鍵的形成期。此時，在「書寫的世界」中，戲術概念成形並獲得了穩定的位置，受到具備書寫能力者的關注、成為了書寫的主題，人們開始有意識地辨識、指認、收集戲術與其操作方式，並將之整理記錄、匯聚成篇。

如前節所述，北大本「神仙伎術」之題詩「白紙自然成黑字」與和刻本「火上炙字」效果相類，但《物類相感志·文房》⁵¹卻也收錄了近似的內容：「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⁵²澆之則成黑字」（清代戲術書《古今秘苑》命名為「白紙見字」），同篇又有「磨⁵³黃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沍則字畫脫在水面上」，與和刻本《事林廣記·仙方幻術》之「水面浮畫」幾同。

《物類相感志》有一卷本及十八卷本傳世，內容頗見出入，架構亦殊不相類，前者分「身體、衣服、飲食、器用、藥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魚、雜著」十二門隸事，後者分「天、地、人、鬼、鳥、獸、草、木、竹、蟲、魚、寶器」十二門隸事。宋軍朋認為兩本同名異實，十八卷本接近贊寧十卷本《物類相感志》的原貌，⁵⁴而一卷本及與之內容大量重複的《格物彙談》則另為一書，與贊寧無關，晚至明代中葉才問世。⁵⁵本文同意三書分屬兩個系統的

⁵¹ 蘇軾：《東坡物類相感志》（皇都〔京都〕：須原屋平左衛門，元祿三年〔1690〕），和刻本，現藏早稻田大學。

⁵² 筆者按：應做「五倍水」。

⁵³ 筆者按：據《事林廣記》、《古今秘苑》，應為「（白）礬」之訛。

⁵⁴ 《郡齋讀書志》著錄「《物類相感志》十卷」，謂贊寧「以博物稱於世」，宋軍朋以為今傳十八卷本《物類相感志》即其所衍。此說若然，則觀十八卷本，可知贊寧原著確實近於《博物志》一類，以搜奇列異為目的的博物學著作，與一卷本大不相同。十八卷本《物類相感志》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1997年），116冊。

⁵⁵ 關於十八卷本／一卷本《物類相感志》與《格物彙談》的作者考據、版本源流和成書年代等問題，參宋軍朋：〈《物類相感志》和《格物粗談》內容之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推斷，但考量一卷本與《事林廣記》對相同條目的不同分類，又一卷本及《格物彙談》的編目型態與收錄內容，均不符合明代中葉新編日用類書的典型，而更近於《居家必用》、《多能鄙事》等早期（元代）日用類書，本文認為一卷本《物類相感志》及《格物彙談》最晚於元代已經成書，倘若范梈跋為真，《格物彙談》甚至可能要早於《居家必用》。⁵⁶

一卷本《物類相感志》（下稱《物類相感志》）與兩宋理學關係濃厚，和其系出同源的《格物彙談》，⁵⁷題名更精確指出了「格物書」的性質，⁵⁸兩者皆以「物類相感」為中心概念，⁵⁹收錄物質相接後產生的特殊效果／現象，如：

身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物類相感志·身體》）

槐花汙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物類相感志·衣服》）

煎血入酒糟不出水（《物類相感志·飲食》）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即落（《物類相感志·器用》）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著經年不爛（《物類相感志·果子》）

養石昌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灑之（《物類相感志·花竹》）

熟悉元明類書者，當能立刻發現上述收藏蔬果、栽植花木的內容，直接為《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以及明代發行量更大、製作粗劣的日用類書所收錄。這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事林廣記》誤植的深層原因：後來被理解為

⁵⁶ 宋軍朋指出《居家必用》之文字敘述較一卷本《物類相感志》與《格物彙談》完足、易曉，因此後者出於前者。按此說未審，文人校訂之際，不乏增長敘述、補足文義的現象，況且目前所見後者的文字脫漏，也可能由於刊刻未精或底本不佳，不必然是文本原貌（如《物類相感志》和刻本即存在大量訛誤）。見宋軍朋：〈《物類相感志》和《格物粗談》內容之比較研究〉。

⁵⁷ 兩書雖分類架構不同，但收錄內容大量重複。關於二者出版順序，學者雖有不同持論，但考量其編排狀況，本文以為《格物彙談》較一卷本《物類相感志》晚出，應是合理推論。相關分析可參宋軍朋：〈《物類相感志》和《格物粗談》內容之比較研究〉。

⁵⁸ 「格物書」一名借自毛文芳。參氏著：〈時與物——晚明「雜品」書中的旅遊書寫〉，載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2001年），頁291-375。

⁵⁹ 《物類相感志·總論》：「磁石引針……滑石去衣油……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見蘇軾：《東坡物類相感志》。

「戲術」的條目，在《物類相感志》的階段，早已基於物類相感的框架，被和洗滌、清潔等條目置於同一文本。這再次證明了前節的推論：部分文獻中混雜曖昧的認識，並非由於元明時人將清潔、洗滌的知識也看作戲術，而是在戲術尚未被認識為戲術之時，《物類相感志》等文本型態的遺存。

話雖如此，內容看似頗具「日用性」，實則飽含理學的氣味的一卷本《物類相感志》，卻未必是後代日用類書的直接源頭。

博物書、格物書與日用類書處於十分不同的思想架構之中。《博物志》意在「蒐奇」與「羅列」，但《物類相感志》雖然同樣蒐羅了各色名物，卻不以列異為目的；「博物」並沒有「申明物理」的企圖，而《物類相感志》之為「格物」書，卻正因其旨在發揚「物類相感」這一「物之理／道之常」，⁶⁰「收錄物與物接而產生的諸現象」此一編纂目的，始終清晰一貫，與六朝以降的博物學及其相關書寫脈絡迥異。⁶¹著眼於格物書對異常的興趣缺缺，甚至可說兩者的關係恐怕並不親近，與格物書更具淵源的文本，當是興盛於宋代的「譜錄」。

同時，較之博物書與格物書，型態上頗有近似處的日用類書，卻既不致意於列異，也無心於物理。元代以降日用化類書的誕生，雖向格物書借鑑了分類的經驗與條列式的書寫方法，但對於「書寫活動與日常實用之關係」的理解，本文認為其典範乃由譜錄發展而來。毛文芳以《硯史》、《香譜》、《酒經》等為例，概括宋代大量出現的譜錄為「研究物類的專書」。⁶²儘管譜錄探討的對象多仍局限於文人趣味相關的雅物，但作為「究明一物一類之性質」的文本，譜錄少涉及物類內部的高下品評（「審美性」較低），重點在於如何製造、栽植、養護、收藏，可以說譜錄雖也有識鑑、博聞的功能，但「為物類建構知識基礎」的企圖

⁶⁰ 陳良佐以為此種「格物」已與成聖成賢「無何關聯」，恐怕稍嫌武斷。見陳良佐：〈從《格物彙談》來看宋明間的「格物致知」〉，載楊翠華、黃一農主編：《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11。

⁶¹ 在部分理學家眼中，「博物」與「格物」的區別也非常曖昧。《河南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十一》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程、朱等「正統派格物」正是透過駁斥、批判《物類相感志》等通過物與物接的實際現象，得出「物類相感」等「物之理」的格物，來確立程朱理學所強調之「內發」的格物。見程顥、程頤撰，姜海軍校點：《二程遺書·伊川先生語十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43。

⁶² 參毛文芳：〈時與物——晚明「雜品」書中的旅遊書寫〉，頁294–95。

顯著，且其中的知識與實踐密不可分（如栽植花木、養護文具的方法等），又譜錄既意在窮究一類物事，必論及其特性與利用，如此則不能不涉及經驗知識的探究與記述——如何增豔花色？如何用去除墨跡？如何防止蟲害？

以譜錄為代表的，對於物類的知性關照與書寫積累，在宋元之際迎來兩種發展方向：其一是轉向「格物書」，如以物類相感為邏輯，建立〈文房〉、〈花木〉等門類，對既有文本進行彙編與再分類；其二則是被引入宋末元初的新型「日用化類書」之製造門、花木門（需注意的是，雙方界線未必涇渭分明。格物書究竟只是讀書人增廣見聞、究明天理的案頭讀物，或曾被實際操作，目前缺乏實際證據，但一卷本《物類相感志》採用「飲食、疾病、文房」而非「天、地、人」的分類方式，似有便於讀者翻查取用的考量）。雖尚無法確定兩者的出現順序與確切關係——《事林廣記》中的「水面浮字」是否採自《物類相感志》？將其歸類為〈仙方幻術〉是編者的匠心獨運，或者前有所本？——但對於同樣內容的迥異歸類（文房／仙方幻術），或許正反映了「戲術」概念誕生未久，尚未普及的情形。

呼應著新的文本架構與書寫企圖，新的分類應運而生，也為書寫的世界引入新的概念。儘管《事林廣記》與《物類相感志》、《格物彙談》的內容有所重疊，但日用化類書的關切並不在「物類相感」等物之理的證明或闡發，而是這些經驗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價值——⁶³「白紙見字」與「磨墨不凍」皆是物質調和的效果，在物類相感的脈絡中，理所當然歸於一處（〈文房〉），但在日常生活的視野下，置實用性不高的白紙見字、水面浮畫於「文房」顯欠妥當，可若在飲宴的場景中將其重新定位，歸類於席間助興的「戲術（教學）」一門，則相當合宜，且看點十足。

要言之，宋元之際，部分具「表演潛力」的、有關「物性」的知識積累，於新興日用化類書引入、重編既有文本的過程中，呼應特定人群之日常生活、社交文化的變遷與需求，被以「戲術（教學）」的框架重新定義。以專屬門類（如〈神仙伎術〉、〈仙方幻術〉）的出現為標誌，戲術概念以「成文」為手段，在書寫、文本的世界中被確立並逐漸成熟，書寫者於是更主動、更有意識地辨認、收集（甚或

⁶³ 在書籍型態上的直接反映，是各條目前被冠以概括其「實效」的項目名稱，多做「○○法」，如北大本《事林廣記》即有「撚線香法」、「白銅法」、「點斑竹法」、「油汙」、「洗毛衣」等，但各條目的筆法風格乃至具體內容，和《物類相感志》並沒有顯著的出入。

創造)戲術，令戲術門的內容越發豐富，在後出的《神仙戲術》/〈神仙戲術〉中，因而能看到數量遠超《事林廣記》，橋段和包裝也越發細緻的諸色戲法(如「白雲歸洞」、「皓月入房」等代表性戲術)。

明清時期戲術的概念越趨成熟，全新戲術接連問世的盛況可想而知，但從漢文書寫史的角度加以審視，整體「戲術教學」的書寫系譜，與宋代的譜錄、宋元之際的格物書淵源深厚，此類文本的章法型態與書寫風格，最初並非為了「傳授戲術」，而是基於譜錄與格物書「申明物理」或「闡發天道」的目的，這當是在閱覽與分析明清以降的「戲術教學文獻」之際，不可或忘的重要背景。

四、消費綜合性日用類書：誰的日用？誰在「居家」？

作為看客觀賞或體驗大型幻術戲法，在漢文書寫史上其來有自、頗成一格，如《抱朴子》、《神仙傳》中早有分身、遁形、催生瓜果等仙術神通的紀錄，而大型幻術如「緣繩登天」，也散見於《太平廣記·嘉興繩技》、宋懋澄《九籀集》之〈蟠桃宴〉等。⁶⁴但「小型戲法的解析教學」，卻是相當晚近的新型文本。不同於此前幻戲文本之讀者搜奇好異的「觀賞」欲求，《神仙戲術》的讀者，更可能被預設為實際運用這些奇技淫巧的操作者。換言之，《神仙戲術》不只是幻戲的紀錄或幻戲手法的揭露、解明而已，其核心性質在於「戲法傳授」的教學目的，⁶⁵呼應著在飲宴之際炒熱氣氛的實用需求。

以玄教門的《神仙戲術》為線索，或作為宴席的談資、或作為參與宴席的常識，包含笑談門、謎令門、風月門、書畫門在內，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能勾勒出一批數量可觀的「宴會知識」的存在。而這些知識的大量存在，實則對綜合性日用類書研究上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給出了關鍵的提示：究竟是哪些人、如何地使用這些文本？

⁶⁴ 相關脈絡的梳理，頗得益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陳嘉藝先生於《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致「幻」：明清文言小說中的幻戲書寫〉，特此致謝。

⁶⁵ 橫山泰子在〈秘術の公開：江戸時代の手品本に見られるまじないについて〉中強調《神仙戲術》是將戲法手法加以公開的文本，但本文認為《神仙戲術》的核心性質並非「解明」而是「傳授」。見橫山泰子：〈秘術の公開：江戸時代の手品本に見られるまじないについて〉。

(一)如何之用：再思四民便「用」

對於現稱「日用類書」的文本群及其消費者／使用者，學界曾有過長期的研究與討論：可能是怎樣的人群、如何地使用這些文本？換句話說，日用類書所反映的生活型態與世界觀，屬於怎樣的群體？

如今的相關研究，則多轉向特定門類的辯證、考源，或透過特定門類的內容，探討某些知識、觀念在明清時期的流傳演變，⁶⁶「日用類書—庶民生活」的連結，已成學界廣泛接受的共識，多見學者逕以之為庶民生活史與文化史研究的直接佐證。然而，庶民與菁英的世界，能否如此清晰地劃分？「庶民」的概念一方面呼應新史學思潮對文化史、社會史的重視，另一方面也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式的二元論社會關係圖像（上層／下層、壓迫者／受迫者、統治者／被治者），換言之，「庶民」並非穩定、不證自明的概念，作為其背景的二元論社會構想，也並非不可挑戰與修正的前題。

王正華曾以視覺性的角度切入建陽出版之日用類書的生產、流通與使用情況，指出其中有著明顯的「城市性格」，⁶⁷關鍵性地提示了日用類書使用者難以「庶民」一概而論的複雜性。儘管如此，她將日用類書的出版以地區劃分，認為江南地區出版的日用類書面向士人家庭，福建地區出版的日用類書則少儒家色彩之結論，實有商榷空間。⁶⁸本文認為所謂「儒家色彩」的濃淡，反映的並非消費客群的差異，而是不同的生活面相。王正華指建陽出版的綜合性日用類書，反映都市新興下級識字層的生活型態，消費者為橫跨四民的「功能性識字人口」尤其強調大夫、算命師、堪輿師、帳房先生及專業代書等，因其「會閱讀又有一定的消費能力」，⁶⁹故在晚明之際成為文化消費的客群。但問題的癥結恐怕在於，這些人掏錢購買「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動機何在？

一個人「能夠（有限地）閱讀」並不必然意味著他會「消費書籍」、有能力參照類書中的範文，自行提筆寫作各類實用文書（如訴狀、書信、契約等），更不

⁶⁶ 參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鹿億鹿：〈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興大中文學報》第27號增刊（2010年12月），頁273-93。

⁶⁷ 參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21-22。

⁶⁸ 同上注，頁18-20。

⁶⁹ 同上注，頁24。

意味著閱讀是其常態的生活經驗與獲得知識的主要管道。為了營生所需，一位大夫或算命先生可能得擁有並鑽研醫書、命書等專門參考書（或為專科類書的形式），但他們何必特意購置一冊包含戲術、時令、官品、諸夷、詩對在內的大部頭綜合性日用類書？⁷⁰這是他們的「日常」嗎？

目前學界對於日用類書的討論，往往忽略了「綜合性類書」與「專科類書」實際上處於非常不同的文脈之中，⁷¹從生成背景到使用人群，都存在相當的分歧。

明代中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之名，多有題為「四民便用」、「士民捷用」者。四民即士農工商，其中「商」且不論，農人、工人多不識字（部分工種，如刻書工等除外），百工之技，主要由師徒口傳身授，⁷²既不識字，所謂「四民便『用』」究竟是如何運用？

明代後期日用類書的定價問題，至今仍是未有定論的公案。小川陽一於〈解題・五車萬寶全書〉整理了當時部分出版物的價格（儘管定價不等於售價），在綜合性日用類書中《五車萬寶全書》定價「銀壹兩」、《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遍覽萬寶全書》定價「銀壹錢」，此外除南京僧錄司刊《金陵梵剎志》二十四冊定價「銀二錢二分五厘」（非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外，其他出版物價格落在「銀捌錢」到「紋銀參兩」間（另有《集古印譜》定價「卅兩五錢」，唯價差過大，暫且不論），又井上進仔細比較了萬曆年間諸多出版物的價格，推定當時書價約為每百頁／銀一錢。無論如何，根據方豪與傅衣凌的研究，萬曆年間一名傭工的年薪不過二兩上下，日用類書便是以「銀壹錢」出售，對於一般工人家庭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磯部彰根據不同的史料，推論就當時底層工人的消費能力而言，應無購買新書的餘力，⁷³若以這些人為目標客群，其中泰半定著化的門類根本無

⁷⁰ 據坂出祥伸的研究，綜合性日用類書收錄的知識多屬救急、應變之用，換言之其專門性遠低於專科書籍，應無法作為執業者的參考。見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医学門について〉，《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47卷第3期（1998年2月），頁1-16。

⁷¹ 吳蕙芳在探討綜合性日用類書（其統稱為「萬寶全書」）之際，曾論及兩者性質差異，惜未能展開。見其《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15。

⁷²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100。

⁷³ 見小川陽一：〈解題・五車萬寶全書〉，載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国日用類書集成・五車萬寶全書》；井上進：《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下轉頁191〕

需存在，不如化繁為簡，更能降低成本、打開銷路，但事實上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的門類組成，可以說是頗為穩定的。

或謂該類文本包含大量關禁條約、柬札訴狀之活套，庶民可購置利用，但倘非經常性有關禁、訴狀的書寫需求，比起購置一套綜合性日用類書，參考範本、自行揣摩，不若委請相關專門人士代為起草，在時間、金錢與文本的有效性上，都更加經濟。且「識字能力」不同於「書寫能力」，「活套」雖說格式固定、易於操作，可要據之寫出通暢易曉、用詞合宜的書面文，仍需相當的知識與書寫訓練，絕無捷徑。

易言之，綜合性日用類書中，一般被認為最具實用性的各式活套與法律常識，銷售對象是「使用頻繁」且「具一定書寫能力」者，家有餘財的商人許是其潛在客群之一，但另一種身兼代書、醫生、儀式主持等角色，也因此需要大略掌握各類知識的人群，則更可能是其目標消費者——明代後期散居於鄉里、市郊的地方性文人。⁷⁴

（二）非民所能自便者也

學界常見的「中下層文人」或「地方菁英」(local elites)概念，與本文之「地方性文人」雖不無近似，但「中下層文人」往往以功名(主要是生員資格)的有無為判準，忽略了那些雖在「成士之路」上早早便掉了隊，但也確切受過經典教育的泛

〔上接頁190〕

大學出版會，2002年），第十五章〈書價の周辺〉；方豪：〈明萬曆年間之各種價格——戰亂中所得資料見略整理報告之一——〉，《食貨》第1卷第3期（1972年6月），頁19；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頁66；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體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明代「古典的白話小説」の讀者層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44期（1980年10月），頁50-63。大木康進一步指出，以白話小説而言，消費客群應為生員階層。見大木康：〈明末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作者と讀者について——磯部彰氏の所説に寄せて——〉，《明代史研究》12期（1984年），頁1-15。王正華對書價問題的論斷與筆者相反，但其以1950、60年代香港新界地區的購書狀況推論日用類書在購書活動中的優先性，恐不能成立，畢竟日用類書此時的社會功能與使用狀況，已然完全不同於明代後期。說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22。

⁷⁴ 當然，目標客群與實際消費者未必一致。在地方性文人之外，「實際上」是否曾有富農、都市手工業者購入、閱讀了日用類書，如今已難檢證。

文人；而特別流行於歐美漢學界的「地方菁英」——除文人外，同時包括地方上具識字能力的專業化與半專業化人士——概念，一方面難以在社會組織中標示出明確的範疇（且工種與個體差異皆應不小），將文人與百工視為一類，亦不盡合於時人通念。

本文提出的「地方性文人」概念，回到作為文人之根本的寫作能力——即能夠操作包含詩詞、日常所需之通俗文體、經典所用之正式文體在內，多樣、複雜文體（而不僅是幾種事務性簡易文體）的能力——試圖從「文」的角度突破「中下層文人」及「地方菁英」的侷限，亦凸顯他們不似在朝文人或都市文人般，具有跨地域的聲名和影響力、可相對容易地與朝廷中央互動，這些文人的「在地」特徵，令其有了不同的社會位置、生活場景和歷史意義。

認為明代後期出版的綜合性日用類書，乃是供「士農工商大眾生活所需」，甚至是「民間生活實錄」的看法，在有關研究中屢見不鮮，酒井忠夫即以為日用類書成於改革派（主要是泰州學派與復社）知識人、山人、處士之手，廣泛流通於四民之間，⁷⁵吳蕙芳亦指日用類書屬於平民消費，原則上為平民直接購買、閱讀，⁷⁶然其說有欠旁證，恐亦不切於當時的社會生活習慣。

所謂類書，究其根本是種「將來源各異的內容分門別類纂輯成冊」的文本，是藉由在紛雜的知識之間建立關係，以進行整合的方法，⁷⁷而不涉及具體內容，因此儘管同為「類書」，性質卻可能有天壤之別。目前學界對於日用類書的討論，往往忽略了綜合性類書不同於專科類書的特殊性，後者的讀者易於想像，但前者卻不易回答：從時令到農作，從求子到四禮，從書畫到飲宴，從詩對到夢卜……

⁷⁵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2011年），頁265。

⁷⁶ 見《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346。儘管吳蕙芳也指出城市民眾較有能力直接閱讀、利用此類書籍，而鄉村民眾則可能需要透過地方識字者的引介說明，但按其整體論述，綜合性日用類書的消費者與利用者，顯然仍以「庶民大眾」為原則。說見其《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65。

⁷⁷ 類書在意識形態層面發揮著「收納萬有於一統」的整合功能。除《永樂大典》外，以三才為首幾乎是所有類書的慣例——天地不言，聖政有徵，以三才為首，實際上就是以「帝王」為首。勝村哲也引用《左傳·桓公六年》，指出「類」乃「信、義、象、假、類」五種命名法之一，意與「血」近，抽象地說，「類」乃是對於事物之
〔下轉頁193〕

是怎樣的人會需要、消費這些求全不求深，內容涵蓋常民一世為人之諸般事宜的文本？這些「常民所需」的知識，是直接為當事人所取用，或者還經過了一層潛在的「中介」呢？

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多有以「居家」為名者，而所謂「居家」本即相對於「居官」而言，乃士人生活的兩種不同狀態。又此前已有學者注意到，這類書籍的標題雖言必稱「四民」，實具濃厚的城市色彩，⁷⁸因而推論其銷售客群應為熟稔城市生活的新興下級識字層，但本文認為，類書中其實內含了兩種不同的生活面向，其販售客群乃是在這兩種生活之交會點上的主體：地方性文人。

直到民國六十、七十年代，臺灣各地鄉鎮上受過一定教育、稍能文墨者，都仍被尊稱為「先生」，凡遇婚喪喜慶、紅白諸事，乃至地方節日祭典，主家無不特意延請到場坐鎮、主持，其人或有一定資財，但生活水平與鄉鎮的其他家戶其實相差無幾。⁷⁹近年關於明清時期地方性文人的研究屢有斬獲，張藝曦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便將研究重心置於散在各地的「小讀書人」，即「地方上的一般士人，這類士人多半只有中低級的功名，或是沒有功名的布衣處士」。⁸⁰他們平日雖能作詩，但水平不高，有地方上的影響力，卻沒有跨地域的聲望，可以想見他們在地方上的角色，與前述「先生」恐有相當的共通之處，且在社會分工未臻完善的前現代鄉鎮，其所需處理應對的事務範圍，應當只多不少。

通過高於一般水平的閱讀與書寫能力，地方上的小讀書人雖非卜算、醫藥、農耕等專才，卻能在通常情況下提供民眾精神與實際生活的指引。薛龍對晚清

〔上接頁192〕

同質性的指認。說參勝村哲也：〈類書の歴史：雑の系譜〉，《月刊しにか》第9卷第3期「特集・中国の百科全書：〈類書〉の歴史・その活用法」（1998年3月），頁12-17。唯筆者並不同意其去脈絡地類比類書與百科全書。

⁷⁸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17。

⁷⁹ 筆者的外曾祖父即是一例。家外曾祖父於日本公學校畢業後，於臺中市區經營國術館，在地方上頗具名望，每每受邀主持地方典禮儀節，舉凡公共事務的開展，主事者也經常前來諮詢意見；外曾祖父家中雖有薄田，生活亦僅稍優於一般農戶而已。

⁸⁰ 見張藝曦：〈導論〉，載《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2022年），頁1。

民國時期抄本的研究，也側面證明了地方性文人所具備之知識的駁雜性與日常性，⁸¹他指出晚清民初出現了基於讀寫能力而衍伸出種種專業與半專業化社會身分，在維繫全體社會生活運作上發揮關鍵作用。基於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存在，並考量當時讀書應舉的整體情形，⁸²本文認為，可以假定當時存在著以具有一定水準之讀寫能力為特徵的「綜合性專業人員」群體，即在鄉文人，他們日常擔任臨時性的風水堪輿師，撰寫祭文與婚喪柬帖，乃至人畜疾病與農事諮詢的功能。

根據王鴻泰的研究，⁸³明清時的教育據其內容與目的概分為「蒙學」與「舉業」兩個層級，明人黃佐於《泰泉鄉禮》中談及其對於教材選擇的主張：「年小者……或用《孝經》、《三字經》，不許先用《千字文》、《百家姓》、《幼學詩》、《神童酒詩》、《史家文移》等書，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經。」可知當時一般的學習流程，當以《千字文》、《百家姓》、《幼學詩》、《神童酒詩》、《史家文移》始，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順序讀畢四書後，方才治經典、學時文。換言之，蒙學與科舉兩大層級，又可細分為「認字習字→韻語背誦→實用文章習作→四書講授→經書研讀與制藝習作」的過程，⁸⁴前三個階段屬蒙學的範圍，後兩個階段則漸次進入舉業的鑽研。過去被指為綜合性日用類書主要使用者的「城市新興下級識字層」（如帳房先生、算命先生、醫生等），除屢試不第遂轉作其他營生的情況以外，主要應是蒙學

⁸¹ 參 Ronald Suleski, *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8)。唯其中之抄本原文的點斷、釋讀錯誤甚多，尚祈留心。

⁸² 如 Benjamin Elman 等學者對明代人口及科舉狀況的研究早已指出，明代中後期人口基數和教育水平攀升，官僚係統無法有效消化能夠閱讀經典（而非單純識字）的泛文人（即受過舉業教育者），這些身具文才之人，需在地方社會中另謀出路。參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Benjamin Elma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⁸³ 王鴻泰：〈學屬對規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4卷第2期（2023年6月），頁369–427。

⁸⁴ 黃佐：《泰泉鄉禮》，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三：〈鄉校〉，頁4b–6a，總頁616–17。

出身者（不見得全部學畢），其讀寫能力以蒙學的內容為基礎，進行職業需求的特化——⁸⁵換言之，他們的讀寫能力非常特定，且由於所受書寫教育尚屬初級，除營生所需文書，即便有範文可供模擬，也未必能夠流暢地進行跨文類——如柬帖、書信、關禁等——的寫作。而在另一方面，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士人」——即受過「舉業」程度教育者——性格，是相當顯著的。

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序文與廣告，經常提及「士子」。《便民圖纂》約成書於弘治年間，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重刊，就序言與其中收錄的一系列「務農女工之圖」，已見非常明顯的士人本位傾向。各綜合性日用類書之「農桑門」、「牧養門」、「牛馬門」中收錄的各種女工圖、採桑圖、打稻圖等圖像，與士大夫階層的「勸農」思想傳統，正是一脈相承的。勸農（圖）的觀看主體站在居高臨下的執政者位置，而不是農業活動的實際參與者。時人于永清為〈序〉曰：

昔漢太子……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威匈奴。先為居室，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使民樂其業，有長居之心，無他使之也。……「貧富之道，莫之予奪。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汜勝齊民之術，故安可置弗講也？……〔此書〕以衣食生人為本……而邑里望助，廣虛完安，明收塞之效，未必非是書便之也。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敦民事，部幾以穀恥乎？……農夫庶眾之事，圖纂既纚纚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⁸⁶

全文以漢代遷民實邊之策起筆，申論安民厚生與國防的關係，中段再次強調「齊民之術」的重要，並稱《便民圖纂》為「衣食生人」之書，治生以齊民，齊民以

⁸⁵ 明末戴重曰：「今亦有大學有小學，小學務識字、通言語、習算數，使可爭訟，使可寫契，使可會債，使可任胥吏，增損文書而已。」即小學（蒙學）階段的目標在於識字、言語、算數的學習，進而根據各人需求強化不同能力，見戴重：《河村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據清鈔本影印），卷一：〈村塾記（己巳）〉，頁10。其中「胥吏」應是同時具備理訟、立契、會計等多種能力的行政專業人士，其培養過程中尤其重視熟習律例與寫作公文：「凡農民選取良家子弟，取具保結，教令習學書寫，講讀律例等書，轉送巡按衙門，定立等第、從公考選。寫字端楷、文移頗通者，列為第一等。」戴璟修，張岳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嘉靖14年〔1535〕刻）卷10，公署〈吏員附·定陞降則例〉。

⁸⁶ 鄭瑄：《便民圖纂》，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頁517-18。

安天下，而全文的關節在於「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那個運用《便民圖纂》以安天下的主體，只能是受過經典教育的文人，換言之，在綜合性日用類書的使用上，「讀書人」的中介是不可或缺的。

《便民圖纂》成書於明代中期（弘治年間），收錄內容、傾向、排版皆近《事林廣記》，雖以「民」為終極關懷，其中切近日常所需的各類農桑、製作、收藏知識，乃製造脯、醬蟹等料理方法，卻並非預設由庶民自行操作運用。儘管王正華認為《便民圖纂》「偏向實用性，尤以農業知識所佔比例最多，與福建日用類書的區別更大」，⁸⁷ 難與建陽出版的綜合性日用類書對照比較，但學者早已指出，儘管出版印行地區不同，明代後期由於交通網絡的發達，形成了跨地域的書籍市場，特別是以南京為中心的幾個主要城市，更是各地出版物薈萃的書本集散地，⁸⁸ 儘管《便民圖纂》應非建陽刻本，卻與之共享同一個市場，即便消費客層或有差異，成於萬曆年間的序文中對「日用類書」的基本看法，也應該是共通的。

「日用類書——齊民安天下」之說，並非一二俗儒的誇誇其談而已，建陽出版的日用類書中，也可以看到大同小異的論調。《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從印刷、編目到所收內文，都是非常典型的「建陽版綜合性日用類書」，其序曰：

昔人謂讀書不必萬卷，下筆自有鬼神，斯言也，豈欺予哉！蓋亦有其要也，一得其要，則繁文不必事，而信手揮毫，罔非驚破人膽者。予於萬卷星羅之編，識其然矣。夫宇宙之內，事有萬也，物有萬也，記事物者亦有

⁸⁷ 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21。

⁸⁸ 大木康整理明人諸說，指出明代後期主要刻書地為吳（蘇常）、越（浙江）、閩（福建）三處，福建本雖品質不佳、誤刻頻見，但以價格低廉及雕板迅速聞名。又根據同書所引周亮工《書影》，萬曆年間南京、蘇杭刻書尚少，市面流通的出版物（乃至兒童所習之經書）多為建陽本。綜合上述，並考慮日用類書「工具書」的性質，不同於攸關科舉、字字較真的經典文本，比起品質精良與否，價格優勢才是競爭關鍵，那麼在明代後期的書籍市場上，很可能不存在「非建陽本的日用類書」。事實上，目前可見的所謂晚明日用類書，也幾乎都為建陽地區刊刻。參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2004年），頁40—46；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頁258。

萬也……無論尋常學者不能窺其藩籬，即聰明穎異之士，日誦數千言者，亦苦其繁而不能竟讀也。乃星羅之編，採萬家之要，擷萬氏之英粹為一書，誠**文林之至寶**也。展而閱之……靡所不載……君子有心於斯……兩間內事羅之胸臆，又何艱哉？嗟夫，**是編最為生人之要，覽其有功於世道，不在六經四子書下**，有神識者，盍知寶焉。⁸⁹

此序上承中古以來類書輔翼書寫的基本功能，強調讀此書可識宇宙之要，以資作文，但序文末段特稱是書「最為生人之要」，補益世道之效，不下古籍經典。這般措辭行文，意在向買家澄清，洗脫自己為「方伎小道」嫌疑，其發言對象當然是受過一定程度經典教育的「文人」，並且他們也是「生人」這一動作的主詞。

關於綜合性日用類書以文士為目標客群的看法，尚有一證。由晚明著名出版商余象斗編印的《類聚三台萬用正宗 / 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封面廣告即稱「坊間諸書雜刻，然多沿襲舊套，採其一去其十，棄其精去其粗，**四方士子感之**。本堂近鋟此書名為萬用正宗者，分門定類，俱載全備，展卷閱之，諸用了然，更不待他求矣。買者請認三台為記。」⁹⁰其中「士子」之謂，當然不會是名列文學史、政治史的大家，也很難想像時人如此稱呼農、工、商人。所謂士子，只能是地方性文人。引言中對本書編纂目的的說明，也值得玩味：書籍的引言，是文本製作者少數能直接與讀者對話，並博取認同的空間，余象斗聲稱出版此書是為了方便讀者「博聞百家」，故而「乘餘閑」蒐羅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這種博聞強記的修辭、「雖小道必有可觀焉」的態度，正是典型的「讀書人」發言立場，而這套說詞企圖說服的對象，自然也不難想見。

⁸⁹ 見《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序》，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頁3。首行「言也豈欺」四字，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補。該本《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全三十九卷，卷首有萬曆二十八年春五雲豪士天樂生序，書末牌記「書林靜觀室春月余獻可梓行」。

⁹⁰ 《萬用正宗不求人》，載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頁4。

(三)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雙重日常」

一名專業商人無需知曉家畜疾病的緊急處理，一位能夠流暢閱讀書籍的農夫即便有耕作知識的需求，也無需了解「農事源流」，更不需要斥資購書，在家中常備包含地理、剋擇、僧道等內容的參考書。但一名居於地方的「先生」，則很有必要大略掌握各門知識，且「農事源流」這樣的章節，對於接受農本教育且大多原則上支持農本主義的泛文人階層而言，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

如果說地理、剋擇、農桑、卜算等門類，反映出地方性文人的「在地(方)」生活，那麼特別是包含戲術、風月、酒令、笑談在內，以「飲宴文化」為中心的門類，則體現了類書使用者的「另一重日常」。

王正華注意到綜合性日用類書對話題性與流行性的重視，她以書畫門為例，指出其意在提供書畫品評的隻言片語，以助讀者參與相關話題，而不是要提供實際操作的指引，也並不較真其知識的準確性。⁹¹延伸她的看法，本文認為綜合性類書中的部分門類，大致提供了各種社交活動之場所、規則、方法、必要知識的介紹，意在協助使用者「經營文人生活、融入文人階層」(儘管該種文人生活屬於文人階層整體的中下部分)，發揮著「成為文人」的「指南」效果。此點尤其可見於以飲宴文化為中心的知識，「地方性文人生活指南書」的角度，更大大有助於解釋歷來被認為不切「日用」的諸多門類之存在意義。

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帶有顯著的城市色彩，部分內容所對應的實踐空間，更明確存在於城市之中。⁹²然而，這並不意味使用者主要或者重要的生活空間必定在於都市。考慮到類書內容的粗淺與片段化，或許正因其使用者並非居住於都市，也不一定熟悉都市生活，卻時而有出入都市的需求，才更需要指南書的導引，而當時有機會與能力(包含經濟及語言能力)頻繁穿梭城鄉之間的，除了行商以外，就是有應考、求學、人際交遊等需要的文人了。⁹³《儒林外史》

⁹¹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35。

⁹² 同上注，頁17-22。

⁹³ 明代中期以降「儒(泛指讀書應舉的士子)」與「商」的邊界高度曖昧、互涉交織：寒窗多年屢試不中，故而棄儒從商，或者經商有成，於是慷慨資助族中望子弟讀書應舉的例子，不勝枚舉。士與商溝通密切，不但可以相互轉換，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彼此重合的。

第五回便描寫了一名欺壓鄉里的「嚴貢生」，在東窗事發之際，隨即一溜煙地「逃」到了省城裡去。⁹⁴

玉置奈保子在其博士論文〈日用類書を用いた明代通俗文学の研究〉中，⁹⁵指出白話小說採入武藝類專門日用類書的內容，以描寫戰鬥場景，這一方面證明了日用類書在中下層文人（即小說作者）間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更指出了「日用類書」作為「通俗文本之創作參考書」的側面，而輔翼書寫的功能，與魏晉以來類書的基本定位，正是一脈相承的。⁹⁶

根據前述，可以說明代後期的綜合性日用類書中，包含了地方性文人的雙重生活、兩種日用：其中一種指向地方性文人與鄉里民眾的社會關係，由「文本直接使用者」與「文本內容需求者」共同構成，以間接的方式體現當時庶民的部分日常與需求；而另一種日用，卻指向文人自身的世界，包含其日常所需、社交生活、營生必備（如代書範例或著書參考），以及在高度城市化且商業色彩濃厚的明代後期，作為一名合格「文人」須知的各種常識。⁹⁷

五、結論

由於日用類書作為基礎工具書的性質，作為處於全體「讀寫層」最底端，輔助、支持着讀寫層之存續的文本，目前罕見記錄、評述其製作與使用情形的副文本，基本上無法透過時人之筆，確定類書的生產過程與使用狀況，而在社會史「研究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之外的常民歷史」的倡議下，一直以來，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都被認為是「庶民生活」的反映／紀錄，是研究明代大眾社會生活的絕佳材料。

⁹⁴ 嚴貢生出身高要縣，該地於明清時雖然富庶，仍屬地方縣城的層級。見吳敬梓：《儒林外史》（臺北：聯經，1978年）。

⁹⁵ 玉置奈保子：〈日用類書を用いた明代通俗文学の研究〉（京都：京都府立大學文學研究科國文學中國文學專攻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⁹⁶ 小川陽一也指出明清小說與日用類書中存在大量重複／相近的描寫，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比較。但他並未明確表示其中是否存在引用關係，而是將日用類書作為解讀小說的旁證資料，認為雙方相同處表現了當時的社會風氣，並著眼於撰者／出版者的重疊，來解釋兩者內容的共通性，詳參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1995年）。對兩者之共通描寫的解釋，見頁41—43。

⁹⁷ 當然，「雙重日常」之說，旨在強調其中包含了不同的日常次元，但兩者並非互不相關，比如醫藥、解夢、卜算等，既可救他人之急，亦可解自身之疑，又如楹聯、啟札之範本，不但可替人執筆，也可滿足個人社交所需。

相對於前述廣為學界接受的看法，本文首先分析綜合性日用類書所收「戲術」之特徵與實踐脈絡，並從版本學、目錄學與出版研究的角度，探討戲術知識形成為類書門類的過程，最後根據文本內容，同時引用明代社會史的研究成果，重議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可能的使用群體與社會機能。

另外，關於明代中葉以降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內容與形制，學者過去多強調它們對《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繼承，但以戲術門／玄教門／風月門／仙術門中題名為「神仙戲術」的小目為例，基於《新刊足本神仙戲術》的存在，可知其內容或許並非直接源於早前的類書，而經過了「摘錄彙編（《事林廣記》）→獨立成書（《新刊足本神仙戲術》）→再次摘錄（《萬寶全書》等）」的曲折過程；同時應予以注意的是，與此前詩文、史事類書博採群籍、「摘文彙編」的方式不同，刪節（偶見增補）個別專書後加以合併成「門」，同時保留書名做為小標題，當是此時綜合性日用類書常見的編輯方式。

按筆者的看法，所謂文人，是掌握了至少三種文體（詩詞、日常所需之通俗文體、經典所用之正式文體）之讀、寫能力的人。以「戲術」為出發點，本文的核心論題之一，就是位處此群體之下層者，與文盲及功能性識字者的相互關係。

就一名語言、書寫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基於狹義的政治或文學等角度理解「文人」，遠不夠充分。在主要通過文字書寫記錄、積累、傳承、生產知識的時代，讀寫能力與其他一切技能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廣泛的、「非功能性」的識字能讀，⁹⁸是有著無窮潛力的特殊技術：那意味著無數年以來龐大的知識積累向此人開放，而「能寫」更直指將其傳承甚至拓展的可能——這正是讀寫能力在不同朝代（以各異的形態與方式）一貫受到重視的關鍵，更是所謂「文人／讀書人」在意識形態層面之優越性與超越性的物質根源。

不同於現代社會扁平且均質化的構想，明代地方性文人的世界，與一般意義上所謂「平民」的空間，既非斷然隔絕，也非簡單的連續，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的存在與熱銷，正揭示出在「文治」——文既是一切由文字構成的典籍（名詞），也指各種不同文體、文本的書寫（動詞）——世界觀中實屬必然的「中介性」特質，於明代後期這一特定時空中所獲得的型態與運作方式。

⁹⁸ 所謂廣泛，亦即其閱讀能力不僅止於帳冊、命書等特定領域，或時下通行、日常頻用的文體，還能閱讀相對於日用俗文的上層文語文（如章表書記、曆法律令），與廣義的、未經特殊訓練無法理解的古典文體，包含但不限於先秦典籍。

以農桑牛馬為代表的「鄉／先生」，與以戲術謎令為典型的「城／士人」，這收納於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雙重日常，本文認為，正是把握此際「文的世界」之結構的關鍵提示。

最後，雖未及於正文中處理，但有關清末日用類書中「戲術門」內容的翻新、變化，以及同時期內容龐雜多樣的「魔術專書」（如《鵝幻匯編》等）之成立，有學者歸因於「西風東漸下之結果」。⁹⁹然而，按本文對戲術的理解，這一現象實際上反映著兩個互相影響的時代動態，即「（地方性）文人」此一身分的整體改變——如其在地方社會上的角色轉換，乃至逐漸解體的過程——與專業「魔術師」及其業務需求的出現。¹⁰⁰

新式教育的普及（以教育義務化為主要形式），是晚清民初「強國保種」政治議程中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儘管推行的過程不盡順利，也未能如預期般在短時間內遍及治下大小鄉鎮，但不可否認，始於晚清的教育改革，以及當時對於新世界、新知識的欲求，使得讀寫層的整體人數發生相當程度的擴張，而新式學制在清末最終被確立為唯一具合法性的知識制度（收編了知識的所有流通、生產與管理），更澈底改寫此後「知識階層」的涵義與樣貌。¹⁰¹

又當既有的個體存在與群體關係，根據民族國家的基本前提，以「去階層、等價化」為原則被重新構造，令「文人」身分得以成立的物質條件與需求不再，其作為「文之中介」的合理性與權威性必然喪失，¹⁰²過去曾被稱為「文人」者，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發生結構性的變革，¹⁰³那麼，原附屬於文人世界的綜合性日用

⁹⁹ 見《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339。無庸贅言，這當然是個典型的西方衝擊論模式。

¹⁰⁰ 藉由異域使節的見聞，可知在道光年間已存在不少規模較大，專業性、表演性與營利性俱強的戲法及其演出者。朝鮮使臣朴思浩著《燕薊紀程》中有〈幻術雜戲〉一篇，描述其在京期間所見戲法表演，內容頗豐，而其規模、型態和《神仙戲術》載錄者殊不相類。

¹⁰¹ 關於清末民初「國民教育體制」確立過程之概要及歷史意義，可參考葉宇軒：〈成為教育學：論明治前期及民國初年荀學言說的近代生成〉（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相關梳理見第三章第二節。

¹⁰² 或謂「鄉先生」的角色在民國之後仍未完全消失，然而合理性、權威性的有無，與實踐的存在與否，本即不同的問題。

¹⁰³ 當然，晚清以降權力機構革新、採用現代化治理方式，嶄新的社會關係因而結成，也是重要的背景。

類書、《神仙戲術》，自然也不得不在「新世界」中尋覓新的社會／知識位置（後見之明地說，這個位置就是「（如今所謂的）魔術」），以填補它遽然喪失的存在意義。

戲術相關言說在此時間點上發生的變化，與戲術被重新認識為魔術的現象（可理解為「現代化」），根本原因不在西學東漸造成歐美魔術大「量」傳入，或者「崇洋媚外」的時代情結，而應該置於文人群體所面對的結構性變化——舉凡新式教育、新式政府組織引發的社會關係變革——與原屬其「日用」的存在，如何漸次解離並被重新脈絡化的視野之中考慮。

附表：各日用類書所收戲術節目與順序

類書名稱	戲術名稱（依原文排序）
《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紙銚炒豆、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噴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吹紙雞子、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水中化石、手帕盛酒、活魚法、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蟻法、辟蚊蟲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治頭上虱、治身上虱。
《類聚三台萬用正宗》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吹紙雞子、紙蝴蝶飛、喚蝴蝶來、暗傳書術、雪裡點燈、鬼吹火、(盆)中走魚、手帕盛酒、藥拂去字、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分杯戲術、玉女傳書、壁上安燈、燒椶羅樹、飛符術、布線縛火、水中石山、手中雪下、燒紙人起、葫蘆提錢、燈上龍見、碗玄吹簫、教鵲跳、鬪雞法、採花種法、洗衣不用灰汁法、使鬼打門、壁上移字、百步吹燈、吹燈不滅、紙上噴花、燈引雞子、火上炙黑字、水中浸洗黑字、活魚法、聚戲蝴蝶、剪燈、撚雲、暑天穿襖不熱、寒月入水不冷、燈上彈蝴蝶、畫貓辟鼠、鼠自咬鼠、畫虎辟犬、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除狗蚤、除木虱、辟蟻法、辟蚊子法、紙銚炒豆、移(?)酒法(自此項起戲術名稱下方不加圓圈)、頃刻開花法、種瓜法、頃刻花法(內容似頃刻開花法)、吞水化骨法、轉碗法。
《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	水上點燈、鬼吹燈、百步吹燈、燈上見蛇影、使鬼搥門、盆內走魚、滾地葫蘆、布線縛火、手帕盛酒、鼠自咬鼠法、辟犬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

《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	上層：飛符術法、取丹□花非時令開、布線縛火、水中山石、手中雪下、燒紙人起、教鵲跳、使鬼打門、壁上移字、火上炙紅字、火上炙黑字、水中浸出黑字、活魚法、剪燈法、吹燈不滅、盡貓辟鼠、紙銚炒豆、紙上噴花、燈引雞子、雞子上壁、鼠自咬鼠、百步吹燈。 下層：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暗傳書術、雪裡點燈、鬼吹火、盆中走魚、手帕盛酒、盆中走紙魚、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分杯戲水、玉女傳書、火不燒衣、壁上安燈、燒梭羅樹。
《萬用正宗不求人》	水上點燈、鬼吹燈、百步吹燈、燈上見蛇影、使鬼搥門、盆內走魚、滾地葫蘆、布線縛火、手帕盛酒、鼠自咬鼠法、辟犬法、除木虱法、除跳蚤法。
《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紙銚炒豆、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噴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吹紙雞子、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形、水中化石、手帕盛酒、活魚法、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蚊法、辟蟻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
《新版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紙銚炒豆、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噴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吹紙雞子、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水中化石、手帕盛酒、活魚法、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蟻法、辟蚊蟲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

《新刻搜羅五車萬寶全書》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紙銚炒豆、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噴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吹紙雞子、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水中化石、手帕盛酒、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鼠自咬鼠、辟犬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
《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	吞水化骨法、小兒踏水碗轉法、百步吹燈、鬼吹燈。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備採萬卷搜奇全書》三十七卷本	白雲歸洞、滾地葫蘆、皓月入房、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紙銚炒豆、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畫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水中為石、手帕盛酒、活魚法、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蟻法、辟蚊蟲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畫虎辟犬、教鵲跳。
《鼎鐫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	白雲歸洞、皓月入房、滾地葫蘆、水上點燈、紙蝴蝶飛、喚蝴蝶來、盆內走魚、藥拂去字、分杯戲術、百步吹燈、布線縛火、吹燈不滅、紙上噴花、壁上移字、使鬼搥門、燒紙人起、鬼吹火、飛符法、玉女傳書、暗傳書信、吹紙雞子、種菜便生、燈上見蛇影、水中化石、手帕盛酒、活魚法、留魚待客、燈引雞子、雞子上壁、畫貓辟鼠、鼠自咬鼠、辟犬法、辟蛇法、辟燕子法、辟蟻法、辟蚊蟲法、除木虱法、除狗蚤法。(後附「收藏洗滌」)

徵引書目

一、專書

《中國文明史話》，臺北：木鐸，1983年。

《新鐫三才備考萬象全編不求人》，書林陳耀吾梓，1602年，現藏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狩野文庫。

王圻纂：《三才圖會一百六卷》，臺北：成文，1970年，據萬曆35年(1607)刊本影印。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1997年，116冊。

朴思浩：《燕薊紀程》，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

吳敬梓：《儒林外史》，臺北：聯經，1978年。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收入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年。

宋楙澄著，王利器校錄：《九籀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4年。

李光裕輯：《鼎鐫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開放線上閱覽。

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國文史，2003年。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古新書局，1977年。

張藝曦：《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2022年。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

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和刻本，元祿12年，載《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事林廣記》，椿莊書院刊本，元至順年間，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

——：《事林廣記》，鄭氏積誠堂刊本，元後至元庚辰年，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載《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事林廣記》，西園精舍刊本，元至順年間，現藏內閣文庫。

- (題)陳繼儒編：《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十六卷，書林懷軒陳恭敬梓行，出版年份不明，現藏尊經閣文庫。
- ：《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三十七卷，書林懷軒陳恭敬梓行，1628年，現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6年。
- 黃佐：《泰泉鄉禮》，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葛洪著，何淑貞校注，國立編譯館主編：《新編抱朴子》，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
- 葛洪著，胡守為校釋：《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碧雲散仙編：《新刊足本神仙戲術》，書林熊氏厚德堂刊，1510年。
- 墨磨主人：《古今秘苑》，清刊本，現藏國立公文書館。
- 戴重：《河村集》，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據清鈔本影印。
- 戴璟修，張岳纂：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嘉靖14年(1535)刻。
-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蘇軾：《東坡物類相感志》，皇都(京都)：須原屋平左衛門，元祿3年(1690)，和刻本，現藏早稻田大學。
- 蘭陵笑笑生原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21年。
- 大木康：《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東京：研文，2004年。
-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1995年。
- 山本慶一：《緒方奇術文庫書目解題——国立劇場演芸資料館所蔵》，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2年。
- 井上進：《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 松山光伸：《実証・日本の手品史》，東京：東京堂，2010年。
- 河合勝：《日本奇術演目大事典》，東京：東京堂，2021年。
- 泡坂妻夫：《大江戸奇術考》，東京：平凡社，2001年。
-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2011年。
- 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国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2004年。

- Elman, Benjami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Suleski, Ronald. *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8.

二、論文

- 方豪：〈明萬曆年間之各種價格——戰亂中所得資料見略整理報告之一——〉，《食貨》第1卷第3期（1972年6月），頁152–54。
- 毛文芳：〈時與物——晚明「雜品」書中的旅遊書寫〉，載劉昭明主編：《旅行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書林出版，2001年，頁291–375。
-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1–85。
- 王鴻泰：〈學屬對覬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4卷第2期（2023年6月），頁369–427。
- 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卷第3期（2021年9月），頁509–60。
- 宋軍朋：〈《物類相感志》和《格物粗談》內容之比較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第5卷第2期（1994年6月），頁83–115。
-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2期（2010年6月），頁169–92。
- 陳良佐：〈從《格物叢談》來看宋明間的「格物致知」〉，載楊翠華、黃一農主編：《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1–17。
- 鹿憶鹿：〈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興大中文學報》27號增刊（2010年12月），頁273–93。
- 葉宇軒：〈成為教育學：論明治前期及民國初年荀學言說的近代生成〉，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

- 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5期（2017年），頁139-79。
- 大木康：〈明末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作者と読者について——磯部彰氏の所説に寄せて——〉，《明代史研究》第12期（1984年），頁1-15。
- 玉置奈保子：〈日用類書を用いた明代通俗文学の研究〉，京都：京都府立大學文學研究科國文學中國文學專攻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 ：〈『金科一誠賦』注に見る明代日用類書の構成方法について〉，《和漢語文研究》第12號（2014年），頁143-67。
- 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医学門について〉，《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47卷第3期（1998年2月），頁1-16。
- 勝村哲也：〈類書の歴史：雑の系譜〉，《月刊しにか》第9卷3期（特集・中国の百科全書：〈類書〉の歴史・その活用法）（1998年3月），頁12-17。
- 黃蘊：〈近代中国の扶鸞結社——徳教からの考察〉，《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4期（2011年3月），頁41-64。
- 横山泰子：〈秘術の公開：江戸時代の手品本に見られるまじないについて〉，《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74集（2012年3月），頁43-55。
- 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体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明代「古典的白話小説」の読者層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学》第44期（1980年10月），頁50-63。

三、網絡資料

- 〈《神仙戲術》驚世魔術秘籍沉睡506年在中國首次出現！〉，<http://www.52magic.cn/news.asp?id=2762>，發布日期：2016年1月5日，讀取日期：2025年2月12日。
- 〈新刊足本神仙戲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k0ixFd-JE>，發布日期：2022年2月8日，讀取日期：2025年2月12日。
- 〈首届「魔術歷史書籍展」在江蘇如東開展〉，<https://www.yangtse.com/content/1680190.html>，發布日期：2023年5月30日，讀取日期：2025年2月12日。
- （題）陳繼儒編：《新刻眉公陳先生編輯諸書脩採萬卷搜奇全書》三十七卷（書林懷軒陳恭敬梓行，1628年），現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放線上閱覽。[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2496037\\$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2496037$1i)，讀取日期：2025年2月11日。

日用的「戲」譜：《神仙戲術》的形成與 明代綜合性日用類書中的「雙重日常」

（提要）

葉宇軒

刊行於江戶年間的《神仙戲術》一書，被日本魔術、藝能研究界公認為日本史上首部魔術專書，地位崇高。然而，一直以來罕為學者注意的是，本書從用字遣詞、記述型態到文本構成，無不顯示其與明代日用類書的密切聯繫。本文首先探討明代數種日用類書之「戲術門」的內容，以及2015年發現的明版《新刊足本神仙戲術》與現存類書小目「神仙戲術」的聯繫，並探究戲術的性質及可能的社會機能、實踐脈絡，進而透過版本學方法，梳理自《事林廣記》以來戲術知識成類的歷史。最後，本文以戲術為切口，通過探討明代後期綜合性日用類書中「飲宴文化」的份量與意義，挑戰多數學者長期以來直接將該類文本與庶民生活相連結的見解，指出綜合性日用類書的預設讀者並非普羅大眾，而是以文人，尤其是地方性文人為主要對象。藉由考索日用類書的「戲」譜，本文同時探討了明代後期的知識情況，嘗試勾勒「文（治）的世界」於此際的形貌。

關鍵詞： 戲術 明代出版 《神仙戲術》 地方性文人 日用類書

Shenxian xishu and the “Dual Daily Life” in Comprehensive Daily-Use Books of the Ming Dynasty

(Abstract)

YEH Yu Hsuan

The book *Shenxian xishu*, published during the Edo period, is recognized by both the Japanese magic research community and the performing arts research community as the first magic book in Japanese history. However, what has rarely gained scholarly notice is that *Shenxian xishu* demonstrate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aily-use books of the Ming dynasty—from its choice of words, sentence structures, narrative styles, to its textual composi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survey of the content of the “trickery techniques” section in various Ming daily-use books. It then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g-dynasty *Xinkan zuben Shenxian xishu* discovered in 2015 and the transmitted versions of *Shenxian xishu*, and goes on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trickery techniques” and their possible social functions and practical contexts. Through a textual approach, this article further elucidat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rickery techniques became a distinct type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since *Shilin guangji*. Taking trickery techniques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perceived connec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daily-use books and the “commoners’ life” by exploring the ubiquitous content related to the “banquet culture” in this kind of text, thus concluding that the readers of comprehensive daily-use books were not the general public but mainly the literati, especially the local literati.

Keywords: *xishu*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Ming dynasty *Shenxian xishu*
local literati daily-use books

